

# 故乡记忆

宋 浩

我的故乡黄院村位于周口店镇以西约 12 里，虽然这是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但童年的记忆却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浮现。

黄院村由上黄院、下黄院、龙宝峪三个自然村组成（后来，龙宝峪从黄院村分出，自建行政村，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体搬迁至辛街村西），有 100 多户，五六百人。上、下黄院距离较近，而龙宝峪却要爬 5 里山路才能到达。哪里有路啊，都是山羊和毛驴多年来踩出的崎岖小道。

解放初期，黄院村是个贫穷却很美丽的山村。村里当时有两多两少，即光棍多、粗脖子多（碘缺乏症引起）；有文化的少、能吃饱饭的人家少。而山沟却有山沟的魅力，满山遍野是果树，桃、杏、梨、柿子、核桃、红枣、栗子等水果应有尽有。水果成熟的季节孩子们跑到山上，家长叫都叫不回来。由于全部是山坡地，土地贫瘠、水土流失，庄稼产量很低，大部分村民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 小山村也要办教育

1948 年底，黄院村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黄院村在原来私塾的基础上办起了小学。学校建在上黄院村东头的一处院子里，翻身后的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因此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近 20 岁才读小学。

我出生于 1944 年，1950 年春节过后，在亲属们的撺掇下，在家无所事事的由我由老姑领着到学校报了名，那时还不到 6 周岁。三个自然村的学生有几十个，只有一名叫杨植亭的教师。教室也只是一间，几个年级的同学在同一间教室，老师给这个年级讲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或者写仿（把买来的字帖铺在桌子上，照着字帖写大字）。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叫宋绍宗的老师，教室也成了两间。我哥哥宋湘当时正在房山师范学校读书，放暑假时还给我们代过课。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支援前方的志愿军战士。我们学校也有一名同学应征入了伍，他叫宋克祺，参军的时候全校同学为其送行。他参军走后，老师叫我们给他写慰问信，我也写了，宋克祺回信说因为我太小，他已经记不得我了，搞得我好不自在。后来他与我们一个女同学结了婚，朝鲜停战后转业到四川省工作。

1953 年初进行学制改革，学习苏联的做法，把春季始业改为秋季始业。当时我刚刚读完三年级，由于学习成绩好，老师让我跳升一级，与读完四年级的

十多个同学一起又上了半年四年级课程，到暑假前初小毕业。

黄院村没有高小，所以五年级我们要到离黄院村有八里多山路的娄子水村去上学，并且还要参加升学考试。记得那天我拿着蘸水笔和用买来的染料兑上水做成的钢笔水。带的干粮是红薯、窝头、老咸菜，妈妈用一条白毛巾对折起来做成的干粮袋。到了娄子水小学后，人家通知原学校的前三名可以免试升入五年级。我有幸以第三名的成绩直接上了高小。

就是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和艰苦的生活水平，黄院村小学的几十名同学，从 1959 至 1961 年有 7 人分别考上了大学。他们是杨敏（北京航空学院），李伯森、宋淇（北京政法学院），宋雅荣、宋克朴、宋浩（北京矿业学院），宋雅民（北京铁路师范学院）。

### “五一”游行和霸王鞭

1952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周口店镇召开庆祝大会，黄院村的青壮年都去参加了。我们学校作为霸王鞭表演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大家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共同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参加完庆祝大会后，游行队伍到附近的各个村里去宣传和表演。

说起霸王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见过。霸王鞭是用一根直木棍做的，长度约 120cm，直径约 3cm，在距木棍的两端 3-5cm 处各开一个方形的槽，2-3 枚铜钱穿在一根铅丝上，固定在槽内。霸王鞭一甩动，铜钱就哗哗地响。在木棍的两端栓上用红布条做成的穗子，木棍用油漆染成不同的颜色，一根霸王鞭就做成了。在杨植亭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学校的霸王鞭队伍训练有素，表演整齐划一，准备游行中好好表现一把。

那天其他学校多是军乐队、腰鼓队、秧歌队，而我们一个小山村的霸王鞭却大出风头，特别是我那年才 8 岁，个子又小，显得格外出众。到各个村里表演，人们不断地指指点点：“看那个小孩，打得多好啊！”

几个村表演下来，我们一个个累得够呛，好容易转完了，还有回家的十几里山路，我说什么也走不动了，是伯父和叔叔们轮流把我背回去的。

### 与“一贯害人道”的斗争

1951 年，原国民党反动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有刻骨仇恨的极少数人，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蛊惑宣传，扰乱社会秩序。当时比较猖狂的是“一贯道”，我们当地叫他们是“拍花的”。传说夜里，他们到谁家屋檐下，向屋内吹口气，就把屋内的人全麻醉了，然后盗取财物或残害生灵。一时间，“拍花的”搞得村里谣言四起、乌烟瘴气、人心惶惶。谁家的孩子哭闹，只要大人说一句，“拍花的”来了，孩子立刻噤若寒蝉，停止了哭闹。

针对反动会道门的捣乱破坏，村里的民兵组织起来白天在村口盘查可疑人

员，夜晚在房顶上站岗放哨。那段时间家家户户都把窗户用石头堵死，妇女和小孩在屋里战战兢兢地度过一个个难熬的夜晚。

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坚决打击，该抓的抓，该毙的毙。同时动员老百姓不听谣、不信谣、不入道、不信道，与反动会道门进行坚决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打击，很快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

## 山村文化

解放初期的农村，吃饭是第一要务，整年为填饱肚子而奔波忙碌，哪里谈得上文化生活。农村没有电，也极少见到报纸，大人能玩的只有扑克牌、纸牌、牌九等，男孩子玩捉迷藏、弹球、狼吃羊游戏，女孩子玩骨头码儿、踢毽子、沙包等。过年时，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蹬高跷，玩得好的能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耍把戏，叫我们羡慕不已。

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玩一种叫嘚台 ( dei tai ) 的游戏，预先在地上划好标志线，然后每个人拿一根长短粗细不等的木头棒子，两个人轮流用自己的木棒击打另一个人的木棒，打过标志线则这根木棒就是你的。我跟着堂兄一起玩，他经常是赢家，我负责给他抱战利品——一堆木头棒子。

那时，农村里手摇的唱片机都极少，较高级的家用电器要算矿石收音机了，从山上拣来含自然铜的矿石，带上耳机，用铜丝反复划矿石，直到收到电台的声音为止。听一段新闻或者戏曲已经是最大的享受了。

讲故事、听笑话也是孩童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晚饭后，在家里点着萤火虫屁股一样的煤油灯，又憋屈又无聊。因此大人小孩三五成群聚集在街上，侃大山、吹牛，以打发漫漫长夜的部分时间。我哥哥特别会讲故事，什么神呀，鬼呀，劫富济贫呀，孩子们都很爱听。黄院只有一条所谓的街道，对面就是黑黝黝的大山，不时有野兽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我是既想听故事，又害怕，害怕鬼神来到身边，也害怕对面山上的野狼。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就把我围在中间，一起听哥哥讲那过去的事情。

看电影当然是更高兴的事了，离黄院村 12 里山路的周口店村经常演电影，只要一听到消息，大一些的孩子一号召，我们就蜂拥而至，成群搭伙的浩浩荡荡地出发看电影。去时天还亮，走山路对我们不算什么。看完回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一群人只有一两把手电，漆黑的夜晚，大家一边聊着电影的情节，一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绊倒、摔跤是常事，常常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为了使老乡们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老师经常组织学生们晚上进行口头广播。我们每隔几十米站一个同学，第一个同学念稿子，我们一个传一个跟着大声学。每天晚上的第一句话都是：“老乡们，注意了，现在开始广播了！”党的方针政策就是这样贯彻到老百姓心中的。

1954 年，我们全家搬到了周口店，从此离开了这个小山村。上世纪 90 年代，经北京市地质部门鉴定，整个黄院村处于地质滑坡带，为安全起见，采取

了整体搬迁的措施，从此这个小山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

宋浩：原大同矿务局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